

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

——基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思考与方法探索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天津 300204)

摘要 通过讨论译本比较研究可能存在的缺陷,认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及其与其他主体的联系,进而开拓翻译过程研究的空间。在此基础上,汲取批评话语分析关于话语即社会实践的论述,在理论层面思考将翻译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研究的可能性,同时在方法论方面提出一个将翻译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研究的话语分析模式。理论层面的思考旨在认识翻译作为社会实践建构和参与社会活动的作用,方法论方面的思考意在探索翻译若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研究可否有一个可操作的研究方法。

关键词 译本比较 翻译过程 批评话语分析 翻译即社会实践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7242(2017)03-0060-05

DOI:10.13978/j.cnki.wyyj.2017.03.011

0. 问题的提出:译本比较研究可能存在的缺陷

译本比较研究,即是对同一文本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分析这些译本的特点,评论其优劣特征。这种评论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依据一定的翻译理论,采取一定的研究方法(包括取样的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科学评判的结果。长期以来,译本比较研究构成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就其研究目的而言,译本比较研究可以发现不同译本在翻译策略方面的特征,并对这些特征进行评论。例如,郑志明(2009)分析马礼逊、裨治文、欧德理与翟理斯所译《三字经》四种英文译文(译本),指出这四种译文(译本)的特点与翻译特色,发现马礼逊倾向于使用意译,而其他三人更倾向于直译;马礼逊与裨治文均未在其译文中附上《三字经》中文原文,而欧德理与翟理斯则使用了中英对照的形式,翻译专有名词时,马礼逊基本上只使用音译,间或添加一些解释性文字,而裨治文、欧德理、翟理斯则是音译与意译混用。除此之外,他还发现马礼逊使用了少数脚注,裨治文选择在译文之后添加了英文注释,欧德理除一处有脚注外,在译文中直接添加了大量解释性文字,而翟理斯另外给中文原文的每个字都附上详细的注释。

译本的翻译研究除了分析对比不同译者的作品之外,还对比人工译本和机器译本的区别。例如,韩红建和蒋跃(2016)基于由《傲慢与偏见》两个人工译本与一个在线机译本及其英语原文构成的平行语料库,从词法和句法层面对比了人机译本的16个语言计量特征及风格特征。他们发现,在线译本在词法、

句法和情感表达等方面都远不如人工译本,而且在在线译本在代词、助词和连词使用上“显化”明显,在标准类型比和词汇密度方面“简化”不足,而句法层面无“明晰化”倾向。除此之外,他们还发现两个人工译本在词汇和句法层面也呈现明显的风格差异,其“显化”“简化”和句法“明晰化”的程度也各有不同。

就研究对象而言,译本翻译研究还将对比分析的对象扩展到网络视频的字幕翻译上面。例如,陈晓莉和钱川(2013)对耶鲁大学网络公开课“金融理论”第一课视频字幕的不同翻译版本进行对比分析,考察不同字幕组采取的翻译策略,在找出不同翻译特点的基础上提出公开课字幕翻译应遵循的规范。这样的研究虽然考虑到视频文本与其他类型文本的区别,如视频文本通过声音和图像两种途径传播内容,其中的非语言要素对视频内容的传达也具有重要意义,而且语言要素与非语言要素因同时出现在屏幕上而具有共时性等等,但是,这些对字幕翻译过程中策略选择的影响与其他文本的翻译在译本研究的范畴内(如考察不同译本的区别方面)并无实质的区别。

译本比较研究所依据的翻译理论,或曰对不同译本进行评判的标准,是翻译界普遍接受的一些翻译理论,如严复的信达雅理论,奈达的等值翻译理论,等等。译本比较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尽管可以采用语料库的方法,借助计算机软件对相对比较大的译本数据进行分析(如韩红建、蒋跃,2016),但大多都是采取人工观察的方法,对可以发现的的不同译本的一些特征进行描述。如此,对相同的译本进行比较研究会因为依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与国际学术话语的交流策略研究”(编号:14BY070)的阶段性成果。

据的理论标准不同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也会因为研究方法的局限导致研究结果在信度上的摇摆。不仅如此,译本比较研究更明显的问题在于,虽然译本比较研究可以比较清晰地将同一作品的不同译本各自的特点呈现出来,但是,对于诸如为什么这些译本会有不同的特征这类问题,译本比较研究往往无暇顾及;而回答这样的问题,对认识不同译本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译者的价值取向,以及这些因素对译本生产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换言之,研究译本产生的过程较研究译本本身更是一个复杂且值得探索的问题。

1. 译者研究:翻译过程研究的发端

与译本比较研究相对,翻译过程研究将关注的重点从译本本身移至译本产生的过程。作为一种过程,翻译“涉及到语篇的产出者与语篇的接受者之间意义的协调”,是“译者作出决定的各种程序”(Hatim & Mason 1990:4)。这样,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被突出出来,成为研究翻译过程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内容。

强调译者的主体性,首先是承认译者作为文化创造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承认其对文本意义的积极建构和创造性作用(陈大亮 2005)。译者的主体性在翻译研究中引起关注得益于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思想观念。例如,阐释学派认为,翻译始终是解释的过程,一切翻译皆为解释,解构主义由于认为意义处于不确定之中更是认为即使是忠实于原作的翻译也是与原作有着无限的区别(参见陈大亮 2005)。基于这种对翻译的认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作用得到研究者的关注,译者源语和目标语的水平、译者的语言风格、译者所受当时历史环境影响、以及译者的价值取向等等,都被认为理所当然的可以影响翻译及其产品,甚至译者操纵文本为一定的社会政治目的服务也被认为是译者的权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译者的主体性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强调了译本是一部译者“再创作”(许钧 2003)的作品。

对译者主体性的强调,有其积极意义,但也会带来了潜在的消极影响。就其对翻译研究的积极意义而言,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可以摈弃那种将翻译视作纯粹是语言间的转换活动的认识,进而更深刻地认识翻译的实质。实际上,随着后现代主义对二元对立思想的批判日益为学者所接受,类似对译本的评判非好即坏的翻译研究开始让位于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探索。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选择性、知识上的创造性、以及他的社会参与性越来越得到认可。正如莫志克和根茨勒(Tymoczko & Gentzler 2007: xxx)所指出的,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于哪些部分调换、哪些部分强调必须做出选择,这

些选择对源文本来说是一种有倾向的再现。这种有倾向的再现不应被认为是缺陷和不足,或被认为不应存在于翻译之中。这是翻译的必要条件,无论明显与否,翻译不是中立的,而是有立场、有目的的。这里,译者所做的选择,与社会活动参与者所做的语言选择一样,成为其参与社会活动、实现其社会作用的一种手段(参见 Heller 1995; 田海龙, 张迈曾 2007)。

然而,对译者主体性的过分强调也会带来令人担忧的后果,如会助长译者以创造之名、行背叛原文之实的倾向,使翻译变成“怎么都行”的语言游戏(陈大亮 2005)。更何况,翻译过程所涉及的主体不仅是译者,还有作者和读者,甚至还包括出版者和赞助者,因而翻译主体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主体系统(同上)。鉴于此,许钧(2003)认为翻译过程应该是“一种主体间的对话”,提倡从关注译者、作者与读者的相互关系的角度研究翻译活动和过程。他认为,尽管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于中心地位,也在“协调”翻译活动中作者、译者、与读者三个主体间关系中起着主导作用,但是,和谐处理各种关系是保证各种因素在翻译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条件。这里,主体间性概念被提出来,较主体性的概念更明确的强调了翻译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为探究翻译的社会实践性质提供了一个方向。沿着这个方向,进一步探讨翻译过程中的各种因素如何相互作用、译者如何在“协调”和作者、读者的关系中“创造性”地从事翻译活动,不仅可以丰富关于译者主体间性的讨论,还可以在借鉴后现代主义话语理论上更深刻认识翻译过程的实质。

2. 翻译过程研究:话语理论的潜在解释力

从译者主体间性的讨论出发认识翻译过程的实质,需要借鉴西方学者对科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进行反思的学术成果。回顾人类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自17世纪以来三百多年间,人们试图用自然科学的标准衡量一切事物、普遍认为一切有意义的问题都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得到实验检验并获得确定答案,但是,面对复杂纷繁的社会现象,人们开始质疑这样一种逻辑实证主义的现代哲学思想(刘亚猛 2008),学者的关注重点也从“我们是如何认识对象的”转向“我们是如何表述对象的”(田海龙 2014),那种坚持非真即伪的二元对立思想,那种认为一旦真便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思想,那种将语言与语言使用者割裂开来、将语言作为一个客体进行的思想,逐渐被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所替代。人们开始认识到话语对事实的建构作用,认识到一些所谓的事实只不过是话语建构的结果,是一定的利益集团借助语言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话语的概念越来越受到学者的

关注,话语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愈加成为学者研究的课题,话语所具有的性质、它与社会事实之间的辩证关系随着学者的探索也愈加清晰。

话语理论在语言学领域的应用引发从事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对社会活动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进行探究,并发展出具体的研究方法,如莱辛格和沃达克(Reisigl and Wodak 2009)通过分析各社会主体之间话语在主题上的联系来研究各主体间的相互作用。将这些成果投射到对译者主体间性的研究上,译者与其他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是一个译者“协调”其与其他翻译主体关系的问题,而且还有译者意志的体现及其权力的实施。换言之,从话语的视角看翻译过程,译者将原文本译成目的文本的过程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间语码的转换过程,也不是一个简单的译者通过和谐处理彼此关系使作者和读者满意的过程,相反,这是一个译者参与社会实践的过程。所谓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按照费尔克劳(Fairclough 2003: 24)的观点,是一种对结构性的可能因素进行选择的控制方式,它可以使某些社会结构性因素发展成为具体的社会事件,也可以通过对其他因素的控制使其不导致某种社会事件的发生。社会实践在抽象的社会结构(social structure)和具体发生的社会事件(social event)之间发生作用。例如,在教育领域,社会结构可以体现为管理机构和教育机构之间的某种等级关系,这种关系可以导致一个教育事件的发生,如可以导致课堂教学的发生,但课堂教学这个具体事件的发生绝对不是社会结构直接作用的结果,不是因为管理机构和教学机构之间存在某种关系就一定有课堂教学。实际的情况是,课堂教学是通过教师教学或学生学习这样的社会实践才得以发生的,换言之,教学作为社会实践是管理机构和教学机构之间的等级关系发挥作用导致教学活动发生的一个中介体。就翻译而言,认为翻译活动是译者的社会实践,那么翻译就是译者通过自己的翻译活动将某些结构性的可能因素变成具体的社会事件的活动,这其中不仅有“和谐”(许钧 2003),还有“权力”斗争((Tymoczko & Gentzler 2007: xxx)。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翻译案例来理解翻译作为社会实践的概念。根据王宏志(2014)的研究,1793年马夏尔尼(Lord George Macartney)使团访华时带来英王乔治三世写给乾隆的国书有两个中文译本,一个收藏在故宫军机处,一个收藏在英国外交档案。前者把使团的到访纳入中国传统朝贡制度的框架内,以一种极其谦顺卑屈的笔调译成,把英国置于藩属附庸的位置,根本地违背了原来国书的内容和精神。后者

则颇能够保留原信的意思,甚至可以说相当准确和忠实地表达了原国书的内容和精神(王宏志 2014: 3),即语调高傲、主张傲慢,表达出一种安抚与劝诱(同上: 28)。王宏志(同上: 44-45)认为,乾隆最早看到的国书中文版本应该是收藏于英国外交档案的那个中文版本,尽管不能排除他后来再看到军机处所藏的中文版本。马夏尔尼使团失败而归与乾隆最初看到的中文版国书有无关系,王宏志没有得出确切结论,但是,他的研究表明,乾隆最初看到的版本是由两名来自意大利的中国传教士在伦敦翻译而成(同上: 37),而收藏于故宫军机处的版本很有可能是由朝廷传令指派在京传教士重译而得(同上: 42)。为什么要重译?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朝廷看到了这个英国使团带来的国书中文译本,认为这个译本不会博得乾隆的欢喜,因而不会使英国使团收到好的访问效果,也不会给两国关系带来好的结果。这里,如果将朝廷指派的在京传教士对英国国书再次翻译看作一个社会实践,那么这个社会实践实际上是企图将中英两国的关系这样的“社会结构”通过自身的翻译转化成乾隆能够接受马夏尔尼使团访华这样一个社会活动。遗憾的是,这个译本没有最先被乾隆看到,乾隆最初看到的那个体现英国傲慢态度的国书译本,就像那个“触怒”(同上: 68)乾隆的礼品清单中文版本一样,很可能就是英国使团失败而归的原因所在。

从这个翻译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翻译不仅仅是将两种文字进行意义的转换;翻译也是译者参与社会活动、体现其意志、实现其目的的一种方式。如此认识翻译的本质,可以从批评话语分析将“话语”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研究的理论中找到依据。在批评话语分析看来,“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Fairclough 1992),是人们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与交流对象的关系、所在场合正式程度以及所依托的机构权威和要表达的价值取向,在选择使用不同的词汇、句式、体裁或者模式来传递信息、参与活动、建构身份、再现事实(田海龙 2009)。这个话语的定义表达了三种含义,一是选择不同的语言形式;二是这种选择是有一定原因的;第三,基于某种原因选择了某种语言形式,是要实现某种目的的。将这个话语的定义投射到翻译上面,这三种含义分别可以表述为:(1)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需要选择目的语中的语言形式;(2)选择这种语言形式而不是那种语言形式是因为译者的一些因素,如译者对读者的考虑,对翻译出版机构要求的考虑,以及译者自己追求的价值取向;(3)译者从事翻译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是意义传递或是文化交流,抑或是实现自己的一些抱负,重新建构一种意境来体现

自己对原文的一种理解等等。如果说第一种含义,即译者选择目的语中的语言形式,可以直接产生译本,那么,另外两种含义对翻译过程生产译本的影响就是间接的了。这种间接的影响,或许是从话语的视角研究翻译过程更为关注的问题,也是将翻译视作社会实践所要探索的问题。

3. 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一个基于话语的分析模式

将翻译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研究,在理论上可以说已经探测到翻译过程研究的实质。然而,如何将复杂和不确定的翻译过程置于可操作的研究程序之中?解决研究方法层面的问题,我们可以参照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三维分析框架,探索翻译作为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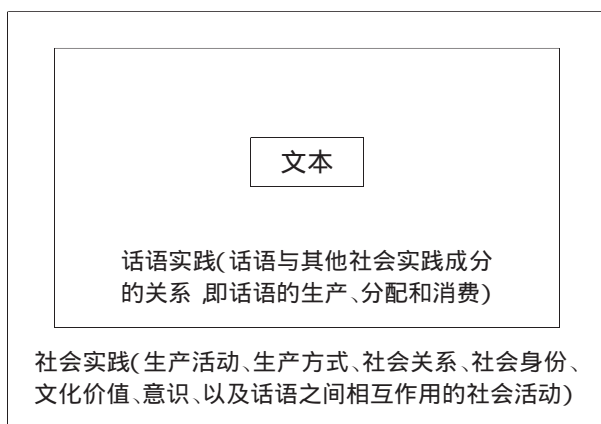


图1 费尔克劳提出的一个批评话语分析三维分析框架(源自 Fairclough 1992: 73)

这个分析框架(图1)是费尔克劳(Fairclough 1992: 73)将话语作为社会实践进行分析时提出的一个分析方法。处于这个框架中心是“文本”,它是话语的体现形式,抑或称为话语作为社会实践的产品。在这个框架的最外层是“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一个多种成分相互作用的社会活动,包括生产活动、生产方式、社会关系、社会身份、文化价值、意识、以及话语之间相互作用的社会活动。这些成分彼此不同,但又不是决然分开的,它们彼此相互联系,在不失去自身的同时将其他成分内化于自身(Fairclough 2012/2001: 187)。因此,对其中一个成分(如话语)的分析,就要分析它与其他成分之间的辩证联系。这便是这个框架的中间部分,费尔克劳称为“话语实践”,即话语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完整过程。简言之,将话语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研究就要分析话语如何被生产、被传播和被接受这样的“话语实践”。这里有必要指出,“话语实践”(discursive practice)这个概念与“社会实

践”(social practice)的概念不同,它是一个为了分析话语作为社会实践中的一个成分而提出的术语,按照费尔克劳(Fairclough 1992: 4)的说法,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和文本一起构成一个话语事件。“话语实践”概念的提出可以在方法论层面更方便将话语作为社会实践进行分析。

将这个话语分析框架投射到翻译研究,可以为翻译作为社会实践进行研究提供一个可操作的研究方法。这个框架中的“文本”可以是“译本”,“社会实践”即前面我们讨论的译者通过自己的翻译活动将某些结构性的可能因素变成具体的社会事件的活动;社会实践涉及多种成分,其中的一个成分是翻译。参照费尔克劳分析框架中“话语实践”是对社会实践中话语成分的分析,我们可以把翻译作为社会实践一个成分的分析称为翻译实践。这样,探索翻译作为社会实践的具体方法实际上就是分析译本的生产(译本如何产生)、译本的分配(译本如何传播)、译本的消费(译本如何被接受)的过程。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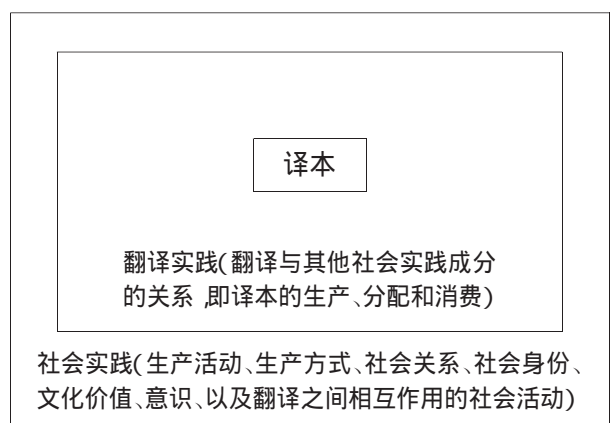


图2 翻译实践—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根据Fairclough 1992: 73 发展而成)

通过对译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分析,即通过对翻译实践的分析,我们期待着探究社会结构因素如何通过译者的翻译导致具体的社会活动。就具体分析内容而言,根据费尔克劳(Fairclough 2003)和范代克(van Dijk 2014)提出的分析话语实践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提出,研究译本的产生可以通过观察译本与原文本的“互文”关系来实现,研究译本的传播可以通过观察传播渠道和媒介所具有的不同分量权重来实现,研究译本接受可以通过观察读者的“语境模式”来实现,如图3所示。

在图3中,右边方框是左边中间方框(即翻译实践)的具体内容,包括分析译本如何生产、如何传播、如何被接受需要观察的问题。下面我们结合一个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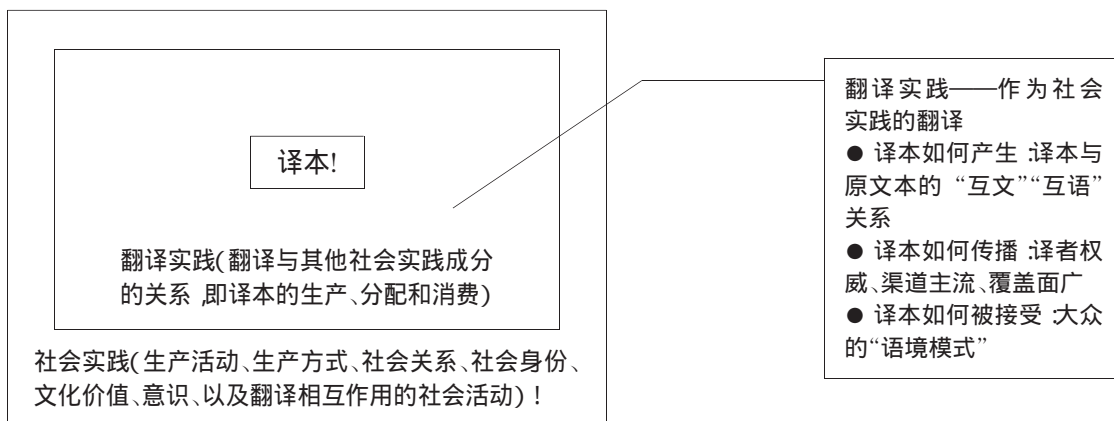


图3 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 翻译实践的分析内容

体的翻译案例进行说明。

2016年11月25日,古巴革命英雄和领袖、古巴前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我国媒体的评论是“二十世纪最后一位伟大战士就此谢幕”。评论中提到,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在他的推特上写了一句话,英文是“Fidel Castro is dead!”在这篇评论里这句话的中文译文是“卡斯特罗,死了”。如果要观察这个翻译过程,并把这个翻译过程视作社会实践的一个成分来考察,那么,我们就要考察翻译实践了。这时,我们的兴趣点不是这样的译文质量如何,不是关注这个译文对与错、好与坏,而是关心这样的翻译是否会社会结构(在这个例子中,美国和古巴两国的关系)转化成某种具体社会活动(如美古两国的外交争论)。为此,我们要关注这个社会实践的一个成分,即翻译实践。我们还要预设,这些理论层面的问题需要具体的方法来解决,因此,依据我们提出的分析模式,将这个翻译作为社会实践来考察,重点要考察这个译本是如何产生、传播和被接受的。

就这个译文的产生而言,“卡斯特罗死了”这个译文与原文本存在一种互文关系,是一种文本的转换。这种转换不单单是文字层面的转换,还是一种经过译者过滤后重新构建的转换,因而是一种“互语”的关系(interdiscursivity),一种带有意识形态意义的中文“话语”和英文“话语”之间的转换关系。换言之,这两种文字之间的转换是一种能动的、被赋予新意的构建式的转换。透过这种转换,更深层次的内容,如译者为什么不翻译成“卡斯特罗去世了”,成为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考察这个译本的传播是考察这个翻译实践的另一个内容。在这方面,话语研究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发体现在福柯(Foucault 1984)有关“话语秩序”的论述中。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对同一个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这可视为不同的话语。这些不同的话语

具有不同的分量,有的处于主流和主导地位,有的则处于边缘地位。这其中的原因包括这些话语各自的发声源是否具有权威、覆盖面是否广以及传播渠道是否有效。在这个翻译案例中,虽然没有直接表明谁是这个译文的译者,但是,它在网络媒体上广为传播就说明它的权威性和传播的有效性是不容置疑的了。

这个译文具有权威性,借助主流媒体传播且覆盖面广,并不能保证它被大众完全接受。如果被大众接受,这个译文就要和受众的“语境模式”达成一致。所谓“语境模式”按照范代克(van Dijk 2009: 25)的说法,指交际者对交际语境的认知,同时也指社会成员对交际语境(如时间、地点、参与者及其角色和身份,彼此间的权利关系等等)的共识。就此译文的理解而言,我们可以认为受众在一般情况下知道“死了”这个词比“去世了”这个词更多的表达对死者的不敬,因此,受众从这个译文中读出的是译者也认为特朗普对卡斯特罗不敬。这种不敬由于特朗普后任总统的身份而上升到两个国家的关系层面,而且由于中文译文“死了”这个词的使用,中文译文在汉语受众身上所体现的特朗普的态度便昭然若揭了。尤其在这篇评论中,更形成了与我国领导人对卡斯特罗尊敬态度的截然不同。

4. 结语

就像我们认为政治家参与政治活动的手段是话语一样,我们将翻译视作译者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以此来体现我们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倾向性立场的认识。为了深化这种认识,我们借鉴批评话语分析学者将话语视作社会实践的一个成分的说法,也将翻译看作一种社会实践。这样的理论思考无疑为翻译过程研究开拓了新的空间。“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这一提法是否可行,需要进一步的理论思考,但

(下转 71 页)

(社会科学版)(2) :147.

- 熊沐清. 2009. 故事与认知——简论认知诗学的文学功用观[J]. 外国语文(1) 6.
- 侯影, 黄忠廉. 2014. 科学翻译文学性简析[J]. 中国科技翻译(4) : 50-52.
- 胡庚申. 2014. 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 中国翻译(1) 29-35.
- 刘汝荣. 2011. 人是符号动物——卡西尔语言观反思[J]. 外语学刊(1) 6-8.
- 潘文国. 2004. 译入与译出——谈中国译者从事汉籍英译的意义[J]. 中国翻译(2) 40-43.
- 徐红. 2015. 文学翻译的辩证观[J]. 外语学刊(4) :116-120.
- 闫艳. 2016. 佛经翻译文本的文学性研究 [J]. 世界宗教文化(4) : 79-87.
- 张曼. 2011. 文学性坚守: 翻译由意义传达到诗意探索[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44-49, 153.
- 赵彦春. 2005. 翻译学归结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 赵彦春. 2014. You are this world's April day[J]. Translating China (2) :75.
- 朱恒. 2015. 语言的维度与翻译的限度及标准[J]. 中国翻译(2) 5-10.
- 朱光潜. 2004. 谈文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Boase-Beier, J. 2011.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Studies*[M]. London: Continuum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Group.

- Cassirer, E. 1944. *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M]. New York: Doubleday & Company.
- Gutt, E. A. 2000.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second ed.)[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Huson, T. 2014.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and transmission of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J].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9-12.
- Jakobson, R. 1979. *Selected Writing*. Vol V[M]. New York: Mouton.
- Saussure, F. de. 1983.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R. Harris (tr). London: Duckworth.
- Shklovsky, V. 1990. *Theory of Prose* [M]. B. Sher (tr). Elmwood Park: Dalkey Archive.
- Sperber, D. & D. Wilson, 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 Stockwell, P. 2007. *Cognitive Poetics and Literary Theory*[J]. *Journal of Literary Theory* 1: 137-138.
- Tsur, R. 1992.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M]. Amsterdam: North-Holland.
- Verlaine, P. 2001. *Romances sans paroles*[M]. Paris: Gallimard.
- 收稿日期 2017-03-16
- 作者简介 赵彦春, 博士, 教授。研究方向 翻译学, 语言哲学。吴浩浩, 硕士, 讲师。研究方向 翻译诗学, 翻译传播学。
- (责任编辑 杨淑华)

(上接 64 页)

是, 参照批评话语分析的框架提出的分析模式至少可以表明, 分析“作为社会实践的翻译”在操作层面是有一定的内容可以观察和研究的。我们期待这方面有更多的思考和探索。

注释:

<http://mt.sohu.com/20161128/n474376646.shtml>, 访问于 2016 年 12 月 1 日 18:00 时。

同上。

参考文献:

- 陈大亮. 2005. 翻译研究: 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转向[J]. 中国翻译(2) 3-9.
- 陈晓莉, 钱川. 2013. 耶鲁大学网络公开课字幕翻译对比研究[J]. 外语学刊(3) :100-103.
- 韩红建, 蒋跃. 2016. 基于语料库的人机文学译本语言特征对比研究——以《傲慢与偏见》三个译本为例[J]. 外语教学(5) :102-106.
- 刘亚猛. 2008. 西方修辞学史[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田海龙. 2009. 语篇研究: 范畴、视角、方法[M]. 上海: 外语教育出版社.
- 田海龙. 2014. 话语理论与语言符号学——福柯与巴赫金对后现代语言研究的启示[J]. 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6) :14-20.
- 田海龙, 张迈曾. 2007. 语言选择的后现代特征[J]. 外语学刊(6) : 8-12.
- 王宏志. 2014. 翻译与近代中国[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许钧. 2003. 翻译的主体间性与视界融合[J]. 外语教学与研究(4) : 290-295.

- 郑志明. 2009. 晚清《三字经》三种英译本特点即翻译特色[J]. 黎明职业大学学报(3) :43-46.
- Fairclough, N. 1992.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Fairclough, N. 2003. *Analysing Discourse: Textual Analysis for Social Research*[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 Fairclough, N. 2012/2001. The discourse of new labour: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Hailong Tian and Peng Zhao.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pp.181-225.
- Foucault, M. 1984. Order of discourse[C]//M. J. Shapiro. *Language and Politic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pp.108-138.
- Hatim, B. and I. Mason. 1990. *Discourse and the Translator*[M]. London: Longman.
- Heller, M. 1995. Language choice, social institutions, and symbolic domination[J]. *Language in Society* (24): 373-405.
- Reisigl, M. and R. Wodak. 2009.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 [C]//R. Wodak and M. Meyer. *Methods of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pp. 87-121.
- Tymoczko, M. and E. Gentzler. 2007. *Translation and Power*[M]. Beijing: FLTRP.
- Van Dijk, T. 2009. *Society and Discourse: How Social Context Influence Text and Talk*[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收稿日期 2017-05-20
- 作者简介 田海龙, 博士, 教授。研究方向 社会语言学, 话语研究, 翻译研究。

(责任编辑 杨淑华)

Abstracts of Major Papers in This Issue

A Revisit to Chinese Double-object Constru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by ZHONG Shuneng & SHI Yuzhi, p.1

This paper makes an attempt to deal with the constructions such as *da-sui-le ta yi-gebeizi* or *zhe-dun fan chi-le woba-bai-kuaqian*, a long-term controversial issue in language studies. Within the traditional framework of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this construction has been wrongly taken as a double-object constru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Construction Grammar, it is assumed that this construction should be categorized into the family of verb-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The verb-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refers to a structure with a causative meaning as well as an extra patient argument which appears between the verb and the resultative because of the complexity of the resultative phrases. In addition, it indicates that the light-verb theory does not work at all for the very problem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The paper is concluded by claiming that our research is of some help to break out the wrong concepts based on structuralism linguistics and the like.

Key words: double-object construction; verb-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Construction Grammar; formal linguistics; light verb
On the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Interface Research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Use of Learners' Dictionaries by GEN Yundong & HU Ye, p.42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interface research for the compilation and use of learners' dictionari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interface research" in lexicographical research are firstly compared. Then the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interface research are discussed in two dimensions: content-optimized dictionary designing and dictionary-integrated language teaching. Finally, this article proposes that interface research as a methodology has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innovating the compilation and use of learners' dictionaries.

Key words: interface studies; learners' dictionaries; methodology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EFL Teachers' Expertise ——Based on Korthagen's Onion Model by LI Weiyang & ZOU Weicheng, p.47

The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 in core qualities between five EFL expert teachers and three EFL non-expert teachers in Shanghai. The analysis based on the onion model of Korthagen (2004) reveals that the expert EFL teachers differ from the non-experts in all the aspects ranging from pedagogical behavior (with competence underlying), beliefs, identity and sense of mission. They are consistent in pedagogical behavior and beliefs. That is, they believe in experiential teaching and focus-on-form pedagogy, and apply them in instructional practice. They keep updating lesson planning while it routinizes reflection and research in classroom. They show a strong sense of identity as teachers but a weak sense of mission. Combining the findings and the onion model, a mod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EFL teacher expertise is hypothesized.

Key words: EFL expert teacher; expertise; the Onion Model

Translation as Social Practice: CDA-Based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and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
by TIAN Hailong, p.60

By detecting the possible problems of comparing the translated text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this paper identifies the translator's role and his relationship with other subjects in the translation process. Furthering the new room thus explored, this paper, by drawing on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discourse as social practice developed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etically reflects on the possibility of conceptualizing translation as social practice, and methodologically proposes a model for analyzing translation as social practice. The theoretical reflections aim at recognition of translation as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participation, while the methodological exploration aims at an operational framework by which translation as social practice is studied.

Key words: comparison of translated texts; translation proces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 translation as social practice

Carson McCullers: a "Sojourner" in the South by TIAN Ying & YIN Qiping, p.88

Shuttl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hometown and the outside world, Carson McCullers devotes herself to writing with ambivalent feelings about the South. McCullers's self-located sense of uncertainty and her writing stand as a "sojourner" are echoed in reflexivity and the spatial narrative, which brings about tensions in her works. Therefore, writing is a sort of exile to her. Leaving her hometown for good, McCullers, a "sojourner" in the South, has become an "alien" eventually.

Key words: Carson McCullers; the South; the sojourner